

以制度对冲转型期道德阵痛

当前,社会上多个领域存在失德失信现象,引发了各个层面的公开讨论和普遍焦虑。有些属于公德的沦丧,比如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问题,以及范跑跑、小说打赏事件;有些源于公权力的失范,比如时有发生“萝卜招聘”、暴力拆迁等。除了公民素质修养、经济发展程度、社会风气熏陶等因素外,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原因: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历史背景。

从上世纪的改革开始,我国进入了革故鼎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原有道德约束体系逐步消解,新的体系还在建构形成之中,社会公众承受着因二者的冲突撕扯而带来的种种不安,容易产生焦虑、功利、浮躁、极端的社会心态,导致不同程度的权力失控、规范失灵、道德失

范、社会失序问题。

其实,不论哪个历史时期,也不论哪个国家地区,每逢重大社会转型时期,都难以避免这种道德阵痛。它不是某一时期特有的社会现象,而是贯穿于人类社会改革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也曾感慨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痛斥“三代之政”不存。在晚清王朝的近代转型过程中,李鸿章预见到“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人心、制度和道德的冲击与破坏无法想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香港地区在从转口贸易港向商业大都市的转型中,经济高速发展衍生着严重贪腐、官商勾结、中饱私囊、行贿受贿等现象比比皆是。局势之严峻,最终促成了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19世纪末20世纪

初,美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转折时期,也产生了诸多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引发了大规模工人运动和所谓“进步主义”运动,才有了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出台与完善。

可见,转型期的道德冲突,蕴含着重建契机。更何况,尽管有经济转型对传统价值的冲击、社会转型对道德评价的调整,但一些是非曲直的基本标准始终存乎人心。虽然有“小悦悦事件”的悲愤,也有“最美妈妈”的感动;虽然有令人不齿的“毒奶粉”制造者,但也涌现了“油条哥”等社会良知守护者……事实上,道德的天空中,依然群星闪耀。因此,对当前的道德危机,要客观理性看待。不刻意夸大其危害程度,不无端怪罪于社会制度,更不要对社会改革的前景丧失信心。

消除转型时期道德阵痛,则要坚持道德建设的制度取向。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党风政风影响社风民风,重构社会道德标准,重塑道德约束力量,要以法治和干部作风建设为引领,把权力关进制度和道德的双重牢笼。要面向全社会做好这项工作,特别是抓好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先进模范等重点人群。

文化是制度之母,要注重发挥文化在制度建设中的指引和滋养作用,在多元多变格局中确立主流道德标准和核心价值体系。最关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秦强

有形的、无形的那只手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就是“政府要不要干预市场”。当然,这一问题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在日前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10周年追思会上,中国两位重量级学者林毅夫、张维迎就这一问题再掀论战。林毅夫认为,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的问题,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在他看来,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张维迎则反对政府过度干预。

笔者不评判两人孰对孰错,老实说,也无此能力。现实中都有支持他们观点的事例。或许真理在两者之间。不过,我倒是对林毅夫一段带有自辩性质的话产生了兴趣。他说,谈到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的作用,这是一个误解。好比大家说我是乐观主义,其实我不是乐观主义,我是客观主义,大家都悲观,我就变成乐观主义。现在我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是靠竞争、靠企业家。但因为现在大家不讲有为的政府,所以好像说我强调政府。其实我两个方面都看,因为有效的市场需要竞争和企业家的精神。国内现在在大部分人对政府强调政府,所以我就觉得比较突出。

根据笔者的了解,林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很孤立的,他指出,国内很多学者都会认为,有形的手伸得太长,会对市场和社会产生过多干预。

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的确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然而,不从理论而从现实来看,在现在的情况下,是不是政府管得越少就越好呢?

这似乎又回到上面林张的争论,但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仔细思考。要讨论这一问题,我想首先得秉持价值中立,从历史进程对政府的作用,即对“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作一番客观考察。一个趋势是,现代国家的政府规模普遍比过去要大,管的事要多,根源有二:一是市场和经济本身在扩张,运行更复杂;二是人们的权利和福利要求比过去更高。所以,不管人们喜不喜欢,都要接受这个现实。

当然,这不是说,大政府就意味着一定要用目前的方式去管理和干预市场,笔者所说的历史发展趋势的大政府,只是在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做强政府,在政府做不好的领域,则必须放弃权力,让位于社会和市场,以尽可能实现管理社会化。同时,政府在干预市场,管理社会时,需要严格遵循法律的制约,要有法治思维。不如此,大政府很可能在一些领域会起到反向效果。

尽管做强市场和做大政府可能是一个合乎事实逻辑的选择,但这两个目标之间也会产生冲突,改革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兼顾的办法,探索出一条两者都能有效发挥作用的路子。 邓聿文

分管领域不能成为“私人领地”

日前,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在线访谈时指出,当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滋长,组织纪律松弛现象已经成为党的一大忧患,部分领导干部各自为政,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变成自己的“家臣”,内耗严重,形不成合力。

对党员干部来说,权力为民所赋,理应权为民所用。不管拥有什么权力,那只是组织和人民给予的公权,而不是可以胡乱作为的私权;不管分管什么领域,那只是为民办事的领域,而不是独断专行的领地。如果公私不分,把公器当作私器,到头来就会因权力滥用而失去官位,失去自由、失去一切。

前不久,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报告了201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刘家义指出,审计结果表明,群体性腐败问题严重,有112起(占35.7%)是“串案”、“窝案”,涉及760多人。同时,从近期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来看,大都是查出萝卜带出泥,查出领导带出一大堆“秘书”、“司机”,等等。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集体腐败、抱团腐败,最根本的就是个别领导干部混淆了公与私的界线,把分管领域当成了“私人领地”,当成了家里的“自留地”,把自己的下属当作“家臣”。有好处,先给自己人;用干部,先用身边人;搞承包,先想圈内人。诸如此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避免分管领域成为“私人领地”,必须牢固树立组织意识,遵守组织纪律。一些党员干部组织意识薄弱,凡事唯我独尊,办事不靠组织靠熟人、靠关系,难免脱纲离谱、脱疆而行。每名党员干部,都是党的人,都要服从组织纪律,服从组织管理,不能有任何“私地”、“家臣”。只有彻底解决好“我是谁的人”、“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才能避免行为失范、胡作非为。

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权力,掌控着公款,掌管着公物,公私分明、秉公用权、廉洁用权,是起码的政治品德和职业操守;公私不分、公款私用、公权已用,既为人民群众所不容,也违背党纪国法的德治。李克强总理说得好,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舍弃发财的梦想。奉劝那些“看得破,忍不过”的官员,如果贪念不断、私心不去,只能是自取灭亡。

人是环境的产物。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私”字当头,搞“私人领地”那一套,与从政环境密切相关。“习与性成”,领导干部应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原则、恪守规矩,带头营造一个好的从政环境,才能让分管领域回到公权为公、公权为民的正道上来。 桑林峰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去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中,“其他支出”竟高达1.3万亿元。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表示:“其他类”金额过高、占比过大是预算管理极不透明的表现。“其他类”科目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这里面究竟花了哪些收入、支出,这种不透明会掩盖一些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对于某些地方和单位的某些公仆来说,“其他支出”可算是一只无比神奇的方便大筐。有了这只神秘的巨筐,常令馋嘴公仆心动不已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更换豪华轿车等就能随心所欲地放手实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必须抓紧财务制度的完善落实,堵住一切财务管理上的漏洞,防范相关人员的腐败倾向,而严肃财经纪律,增强财务透明度尤其是让“其他支出”不再能够成为许多违纪违法行为的挡箭牌,已是当前十分紧迫的事了。 吴之如/画

“其他支出”欠透明



政务微信要“开花”还要“结果”才会有威信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编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4)》显示,截至2014年3月底,政务微信总量已达5043个。除中国台湾地区外,政务微信全面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动手手指、滑滑屏,就能实现“指尖上的政民对话”,政务微信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我国政务微信已超5000,这是一个利好消息,说明我们的政府部门和行政人员的执政理念悄然发生变化,在自媒体、新技术的带动下,开始学会用新思维解决新问题。具体说来,全国政务微信主要分布在区县及以下,占比为75.46%。政务微信扎根基层,距离群众最近,已经成为政民沟通的全新平台,发挥着重要的政府公共服务功能。

政务微信能够在政民沟通中发挥良好的作用,与自身的传播特点有很大关系。有人比喻,微博像一个广场,是公共场所;而微信像小酒吧、小饭馆,更适合比较亲密的朋友,能够更好地进行一对一交流。政务微信一对一的双向性、私密性,进一步拉近了官民距离,促发网友的咨询愿望,很多在微博里不方便说的话,人们可以通过微信寻求帮助,互动效果更好。不仅如此,政务微信还兼具问询和便民服务的功能,以及可以赢得舆情控制的关键时间。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已有部分政务微信出现

更新不及时、缺乏互动、流于形式等问题。这并不鲜见,比微信年长几岁的微博也曾遇到过这类问题。新媒体蓝皮书指出,政务微信存在着“四大误区”,比如以自我为中心,忽视用户体验;信息量上的贪大求全;重发布而轻服务,前端“发布”与后端“服务”未能兼顾;过度地追逐粉丝数等。如果政务微博当初遇到的问题,政务微信如今同样遇到,只能说明老问题没改,而跟技术无关。如果抱着“开总比不开好”、“别人有,我们也要有”的态度对待政务微信,而不是去潜心研究怎么充分利用好、运营维护好微信,使之成为解决问题和民意反馈的有效通道,那么政务微信不仅形同虚设,难以再有大的发展,反而还会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一堵“隔心墙”。

不少微博、微信都是领导拍脑袋决定的,但开通之后,有的领导亲自体验,甚至亲自维护,经常与具体负责人员交流探讨;有的领导却只关心开没开,上没上,一直是个“门外汉”,也不再投入人力的支持。其实,政务微信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领导的关切所在和具体作为。新媒体蓝皮书指出,政务微信应立足本地,做好服务,吸引辖区内的微信用户成为政务微信的忠诚粉丝,这才是立足和发展的根本。开前理性评估,开后务实运作,唯有这样,政务微信才能进一步推动政府为民服务的“威信”。 宋华

“上半场”GDP注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的初步核算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6904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经济“缓中趋稳”态势明显。

7.4%的增幅,首先厘清了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判断。中国经济是“缓中趋稳”还是“缓中趋降”?与去年上半年7.6%的增幅相比,似乎经济增长脚步有所放缓,但如果从去年下半年为起点看,实际上宏观经济走出的是一个先抑后扬的曲线。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用电量、外贸出口等核心指标数据同样反映出这一点。经济不是在降,而是在稳步回升。实际上,7.4%也没有偏离全年经济增长“7.5%左右”的设定目标,鉴于下半年经济增长和改革预期回温的双向刺激,经济在下半年适当加速并达到预定全年目标并不费劲。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当下的主要运行特征是“稳”而不是“降”。

7.4%的增幅,还为未来一段时间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底色:如果经济仍在合理区间运行,那么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的概率就微乎其微,即使出于稳增长出发实施微刺激,也只会出旨在补齐经济运行中短板的定向型刺激政策。由于棚户区改造、铁路投资、向三农和小微企业输血等政策已在上半年出台,因此除非经济环境出现大的变化,下半年有可能进入微刺激的评估和小幅调整期,政策不会大起大落。

7.4%的增幅,还提供了一种实践经验:在传统支柱产业步入调

整期的同时,宏观经济能否经得起冲击。今年上半年的各项数据中,引人注目的下降数据来自房地产行业领域。尽管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高过两位数,但增速已在回落,而房屋新开工面积和商品房销售面积也出现双降。对于以房地产业为财政和GDP主要支撑的一些地方来说,新出现的这种市场变化造成的冲击不小。此外,与房地产业调整同时,许多三高产业也被强力调整。尽管这些调整对于地方GDP影响甚大,但从总体经济层面看,其冲击仍然可控。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平稳进行结构调整的空间很大。

从两位数的GDP增幅到以7.5%为轴的增幅,从传统支柱产业纷纷进行调整,从全面刺激到定向刺激,这些变化的叠加,折射出来的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今年“上半场”GDP的增长以及其驱动力发生的情然变化,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作了一个现实的注解。习惯于GDP匀速增长的常态,而不患于GDP过敏感一味追求数据上的漂亮,是一个重要命题。

其重要性在于,如果GDP一有变化就大惊小怪,就呼吁无限刺激,那么只会把经济的未来增长空间无谓消耗掉,同时带来一系列后遗症。这种教训不是没有。当然,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和社会治理,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而维持这种增长最有效的手段,是继续寻找改革红利。微刺激所优化的经济生态,必须凭借改革的有序推进,才能散发出全局性的、更持久的效果。

徐立凡

真正把暑假还给孩子

眼下,虽说中小学都已放暑假20余天了,但笔者发现仍有一些中小学生在每天还是早早地提着书包走出家门,到附近的学校或老师家中补习功课。

通过调查,笔者进一步了解到,中小学生在放假补课并不为奇,虽然教育部门反复强调严禁利用假期组织学生补课,但一些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在孩子放假前就开始为孩子们联系好了家教班、补习班,从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有补习计划,也不管孩子在学校哪一科掌握得好,哪一科掌握得差,只要能补就补,根本不考虑孩子的感受。

对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和让孩子参加补习的做法,孩子们的感受又是如何呢?采访中我们感觉到大多数孩子对此都十分反感,只是迫于家长的压力,敢

怒而不敢言,只好硬着头皮参加补习。邻居一位10岁的小女孩每天上下午都要去某老师家里补习数学和英语,问她是不是愿意参加补习时,她怯生生地对笔者说:“没放假时,爸爸妈妈就为我联系了这位老师,我可不想来,可不来爸爸妈妈就吵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言而喻,作为家长希望子女成才,是人之常情。但要知道孩子经过一个学期的紧张学习,需要有一个休息调整的阶段。如果把孩子的假期变成“突击补习”的假期,孩子就得不到应有的休息。所以,对待孩子的暑假,家长们要现实一些、开明一些,要多给孩子一些“理解”,真正把暑假还给孩子,让孩子们在暑假里有一个“自由天地”。这样,既有益于他们的身体健康,又能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提高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 袁文良

“辞官感言”触动谁的心弦

近日,一份“温州平阳副县长周慧辞职感言”在网上频频转发。对于辞官一事,38岁的周慧说:“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自我掌控的生活。”

官方也回应称: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事情,周慧的家庭条件比较好,家人在意大利。家里的意思是,在县里工作那么辛苦,还不如和家人团聚比较好。如果还在岗位上,就难以和家人团聚,他也不想当干部,所以权衡利弊之后,他做出了辞职的决定。

然而,很简单的事情,处理起来并不容易,就周慧来说,面临的还有官场内外的流言与蜚

语、疑惑和不解,相应伴生出种种猜测,让人解释与不解释都觉得很难。

这自然与当下现实相关联。一直以来,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已然成为无声遵循的惯例。

“辞官感言”与其说是记录辞官的心路历程,不如说是触动当地“官本位”心弦的一段插曲。偶然的“跑调”,反证出一些地方官本位体制与观念的根深蒂固。让一个官员的辞职引起如此大的关注,本身也是一种期待;在干部人事制度与选拔任用制度上,需要进一步加快改革,让官员能进能出,有上有下,体制内外的流动变得正常和频繁起来,让辞官不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木须虫

新一轮公车改革仍须警惕“下有对策”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有关指导意见和改革方案,全面推进公车制度改革,中央和国家机关率先推进车改。本次公车改革,将取消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用车将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社会化的方式以及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

车轮上的浪费和腐败,是长期存在于我们社会的巨大“疮疤”。在经过多年准备后,中央推出改革方案启动新一轮车改,改革的手术刀正式斩向公车顽疾。公众对推进公车改革呼声很高,此次车改方案中体现出比较彻底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方向,没有让公众失望。

我国对公务用车一直实行实物供给制度,这一供给模式的弊端愈来愈明显。车辆配备范围过大、运行管理成本偏高、公车私用等问题,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1994年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明确,省部级以上干部可以配备专用公务用车,其他职务干部不专门配备公车,

只派用公用车。政策规定的模糊性让车辆配备的范围不断放大,厅局长们将专车待遇视为必不可少的标配,在不少地方和部门,科长、股长这样的“芝麻官”也通过职权,享受着事实上的专车待遇。越来越庞大、豪华的公务用车,造成了严重的财政浪费。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执行数为71亿元,其中公车消费在“三公”经费占比达60%左右。从各地公开的“三公”经费看,地方公车消费的占比更高。此次公车改革的原则之一,是改革后公务用车支出总额必须低于改革前的公车运行支出总额。因此改革将节约政府开支,促进建立节约型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在事关民生的刀刃上。

庞大的公务用车不仅造成巨大财政浪费,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公车私用现象不断损害着党政机关的形象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豪华公车满足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享乐欲望,也强化了他们的特权意识,使他

们与群众渐行渐远。正是如此,此次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也成为党政机关贯彻落实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精神的一项重要措施。

此次公车改革酝酿多年,中央在推出改革方案的同时,宣布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为全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率先做出示范。由此也可看出,公车改革因为牵涉人员众多、利益格局复杂,改革难度非同寻常。公车改革难就难在,各地各部门的官员是公车制度改革的执行者、监督者,同时他们也是现有公车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正是由于各种利益群体的干扰、阻挠,我国公务用车制度此前经历了不断改革、不断回潮的尴尬。首轮公车改革从1994年始,但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与改革同行的是公车数量的持续增长,公车购置和运行费用持续膨胀。

此次采取比较彻底的社会化、市场化改革,坚决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并以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相关车辆。但此次改革方案中的部分规定,可能让一些领导干部钻空子。

方案规定,“确因环境所限和工作需要不便参改的,允许以适当集中形式提供工作用车实物保障”。如果监管不力,一些干部不仅会紧抓公车不放,甚至可能同时骗领补贴。另外,在过往各地的改革中还经常出现,一些职能部门领导一边领取补贴,一边以“借用”的名义长期使用企业的车辆,这种腐败现象在本轮改革中也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同时,在本轮公车改革中,还要特别警惕一些地方和部门,以公务交通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

一些领导干部在既得利益受损的时候,总会采取各种变通手段蒙混过关,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车改革是自上而下、统一部署的改革,要想边缘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变通”,确保各项方针政策落实,离不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司法机关的通力合作。同时,公车改革过程中,还必须发挥社情民意和单位内部职工广泛的监督作用,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助力消除固有利利益格局的阻碍,推动改革走向成功。 樊大斌